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

项目编号: 04JDXM76001

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项目编号: 2013WZJD0041



冼星海音乐思想、 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 文集

著◎周广平 等

冼星海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

项目编号: 04JDXM76001

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项目编号: 2013WZJD0041



冼星海音乐思想、 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 文集

著◎周广平 等

XIANXINGHAI YINYUE SIXIANG
RENGE JI WANQI ZUOPIN YANJIU
WENJI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文集/周广平等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548-0743-9

I. ①冼… II. ①周… III. ①冼星海(1905~1945)—
音乐评论—文集②冼星海(1905~1945)—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J605.2-53②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1858号

责任编辑:林 茵 郭真
责任技编:涂晓东
装帧设计:黎国泰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西洲园工业区笔岗路18号)

889毫米×1194毫米 16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00 000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07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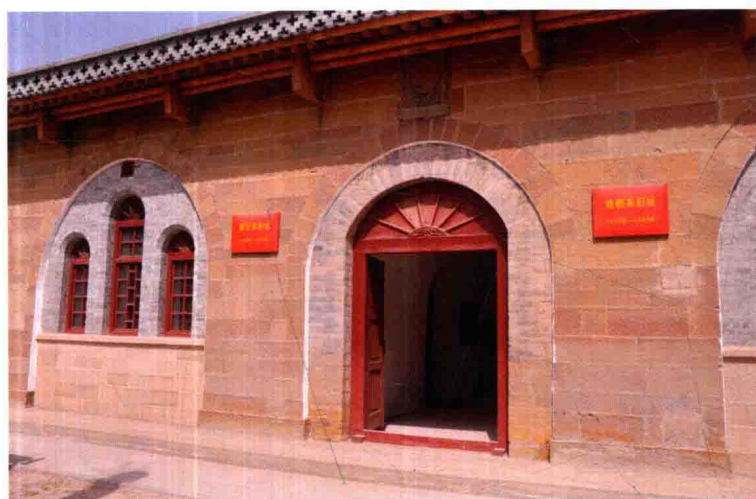
定价:18.6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邮箱:gjs-quality@gdpg.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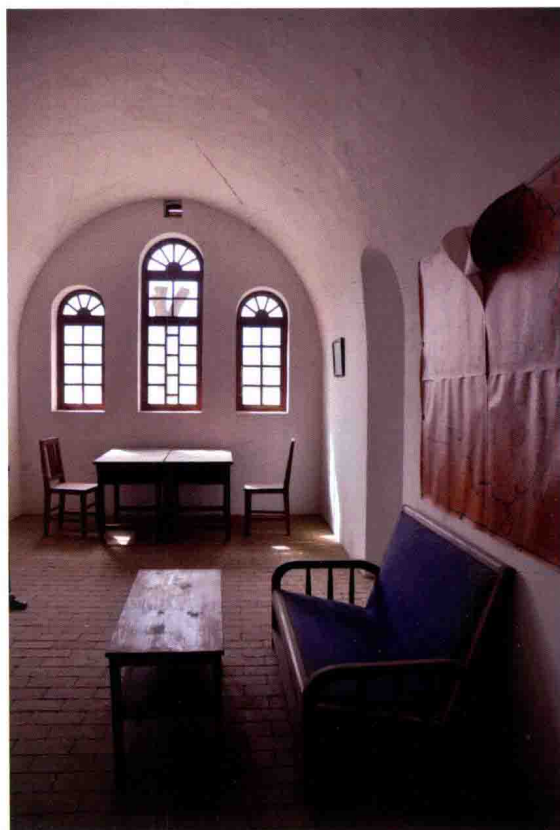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15809



“鲁迅艺术学院”旧址。1938年，留法归国并且在国内有相当知名度的冼星海奔赴延安，成为延安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名勇将，同时，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系主任，主要负责教授音乐理论、作曲及指挥等课程。



“鲁艺”音乐系和戏剧系旧址。课题组成员考察了“鲁艺”当时的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里面还展出了当时教学使用的钢琴、圆号、大提琴、二胡等乐器。



“鲁艺”音乐系办公室内景一侧。冼星海在“鲁艺”任教期间曾在此办公。



“鲁艺”图片展览室。
这些珍贵的镜头都是由“鲁艺”师生们亲自拍摄，它们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鲁艺”师生们生活、学习、劳动的各个侧面。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这里处处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此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对“鲁艺”的教学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位于延安市北二道街的原中国
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内景一侧）。





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内景。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场。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梁，一个个窑洞一座座房。” 杨家岭革命旧址——窑洞内景。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了真正感受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中所描绘的“黄河”气势，课题组成员还亲身领略了位于陕西宜川县境内的黄河壶口瀑布。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救亡室。1938年冼星海夫妇从武汉辗转进入延安之前，以及冼星海1940年从延安即赴苏联之前都曾在此滞留，期间在此做过《关于交响乐结构与作用》的报告，也曾演奏过《黄河大合唱》片段《黄水谣》。

当地艺人为课题组成员献唱
《赶牲灵》等陕北民歌。

延安街头卖艺的民间艺人。在考察期间，课题组成员通过与民间艺人的交流，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饮食习惯、方言、地方音乐等。



前言

2009年“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这一课题是从2005年星海音乐学院原省级重大项目“冼星海历史档案、音乐作品与创作研究”变更而来。原课题负责人为明言教授，由于明言工作调动，研究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经明言本人同意，报省教育厅批准，于2010年改由原课题组成员周广平教授担任研究课题负责人，并对研究课题做了一定的调整。

经过课题组成员的认真研究和反复讨论，大胆跳出以往的研究视域，将研究重点落在1940—1945年冼星海客居苏联的晚期作品研究中。这部分作品由于创作于异国他乡，远离国内红色的革命环境，更多地体现出较强的艺术性。课题组成员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揭示了冼星海的艺术风格、音乐手法和思想情感。与此同时，更客观地指出了其中所存在的作曲技术缺陷，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析，并且，延伸到了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历程问题。这极大地丰富了冼星海音乐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的空白。更可贵的是，研究者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以往的红色政治观念，更加关注于作为艺术家和普通人的冼星海所走过的艰难音乐历程以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在课题开展的近一年当中，课题组成员各自按照自己研究的关注点，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形成了本文集。这些文章从多角度、多侧面对冼星海及其音乐进行了关注，总体来看，研究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科建设角度探讨冼星海研究问题。例如，周广平的《也谈冼星海研究的完整性——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一文，特别提到冼星海研究中所存在的历史资料不完整性这一问题，如冼星海在海外（新加坡、法国、苏联）的生活资料缺乏记载和研究，这影响了研究者对冼星海准确、全面的认识。作者还对未来的冼星海研究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尊重历史，端正研究观念，将冼星海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人们真正客观、真实、完整地了解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二是沿着冼星海生活的轨迹，拍摄一部纪录片；三是修订冼星海年谱；四是整理和出版冼星海作品音乐，让冼星海的理想变为现实。

第二，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冼星海进行分析。例如，罗小平的《高AQ——冼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探究之一》和《析音乐家冼星海的个性心理倾向性——冼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探究之二》，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冼星海的性格特征与其音乐创作和事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研究，为现阶段冼星海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从美学角度给予分析研究。例如,王少明的《现象学:解读冼星海“中国新兴音乐”的启示》一文从现象学理论出发,对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给予了学理分析,文章涉及现象学理论的“悬置”“回到事情本身”和“意向性”三个方面,使冼星海音乐的研究上升到哲理性的思考,并引发了“中国新兴音乐”的重新解读。

第四,从音乐形态学方面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通过对冼星海作品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冼星海作品的艺术特点,其间也不乏对其不足之处的点评。例如,常敬仪的《独到的浪漫——冼星海古诗词歌曲的艺术风格》,对于作曲家在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所借鉴的古诗词中对仗、抱韵、促拍及国画中大写意等技法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音乐的架构、布局、旋法等创作手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邓希路的《冼星海两版〈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形态比较》一文,通过对《黄河大合唱》的两个不同版本——延安版和莫斯科版的音乐异同比较,揭示了冼星海在艺术上的追求和想法,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技术上存在的不足。王沥沥的《一部充满中国情愫的遗憾之作——谈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一文,则以冼星海晚期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了曲中的中国元素运用,以及作品中所闪现出的作曲家的极大的艺术天赋,与此同时也分析了其中所存在的技术缺陷。此外,可贵的是几位年轻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很少人问津的冼星海晚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上,他们在作品的形态学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黄燕的《欸乃一声山水绿——冼星海艺术歌曲〈渔父词〉的民族风格分析》、刘沁沁的《伤别处,音尘绝——冼星海艺术歌曲〈忆秦娥〉分析》、胡嫔的《冼星海〈古诗十首〉(作品25号)创作研究》、龚天旭的《冼星海晚年五首艺术歌曲的音乐形态与情感内涵》等,不仅梳理和归纳了冼星海在艺术歌曲创作中所使用的各种作曲技术手法,而且充分挖掘出冼星海在艺术歌曲中所展现出来的性格特质与艺术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的成果还直接用于指导实践。经过课题组多次讨论和反复研究,在尽可能遵从作曲家的创作意旨的前提下,将冼星海的晚期艺术歌曲再现于舞台。“忆秦娥——冼星海晚期古诗词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的成功演出,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历史价值。

第五,从社会传播和影响的角度关注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例如,周广平的《〈黄河大合唱〉在海外华人音乐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选择了冼星海最富影响的力作《黄河大合唱》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出发,考察和分析了这部作品在海外华人音乐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文章涉及《黄河大合唱》在海外的演出状况、在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还谈到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所倾注的爱国热忱与他个人漂泊海外的经历之间的关联。郑敏的《〈黄河大合唱〉传播的多重模式探析》一文提出《黄河大合唱》在其传播过程之中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革命性,并指出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两种传播方式交替出现是《黄河大合唱》的主要传播方式。

总之,在这几年的研究过程中,在一次次的激烈讨论会上,在一次次思想的碰撞中,可以看到,课题组每一位成员对冼星海的研究,除了带着学者所应有的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外,更多的是星海音乐学院人内心深处对冼星海饱含的那份情感和执着。在这段研究的日子,学者们在享受每一次收获的喜悦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尽管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但是,冼星海的研究仍然有着巨大挖掘和研究空间,“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将只是现阶段研究的新起点,今后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课题组

2015年1月

目录

学科建设探讨和研究

也谈冼星海研究的完整性

——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周广平/1

音乐心理学研究

高AQ

——冼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探究之一

罗小平/8

析音乐家冼星海的个性心理倾向性

——冼星海事业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探究之二

罗小平/16

岭南文化特质与冼星海的文化品格

周广平/24

音乐美学研究

现象学：解读冼星海“中国新兴音乐”的启示

王少明/31

音乐形态学研究

独到的浪漫

——冼星海古诗词歌曲的艺术风格

常敬仪/37



冼星海两版《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形态比较	邓希路/54
一部充满中国情愫的遗憾之作	
——谈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	王沥沥/79
伤别处，音尘绝	
——冼星海艺术歌曲《忆秦娥》分析	刘沁沁/90
欸乃一声山水绿	
——冼星海艺术歌曲《渔父词》的民族风格分析	黄 燕/98
冼星海《古诗十首》（作品25号）创作研究	胡 婷/109
冼星海晚年五首艺术歌曲的音乐形态与情感内涵研究	龚天旭/122

音乐传播学研究

《黄河大合唱》在海外华人音乐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周广平/141
《黄河大合唱》传播的多重模式探析	郑 敏/146
后记	/151

也谈冼星海研究的完整性

——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周广平^[1]

〔摘 要〕文章就冼星海在海外的几段经历，如冼星海在澳门、新加坡、法国、苏联等地的诸多史实不详带来的疑问，提出思考与建议：尊重历史，首先就要端正研究观念；其次，沿着冼星海生活的轨迹，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再次，在拍摄完成专题纪录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最后整理、出版冼星海的全部作品，包括曲谱和音响，让冼星海的理想变为现实。

〔关键词〕冼星海研究；海外实地调查；专题纪录片

一、引 言

冼星海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他在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世人公认，是毋庸置疑的。自他逝世以来，各地专家、学者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大型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十卷本的《冼星海全集》，专门建立了纪念馆、纪念公园，还将原广州音乐学院命名为星海音乐学院。以冼星海研究的科研立项也不胜枚举，冼星海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冼星海的代表作，如《黄河大合唱》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曲。可以说，冼星海作为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已深入人心。

本人作为多年从事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与教学的教师，每每在讲到冼星海的章节时，总是被种种难题所困扰：冼星海的生活、创作经历的史料不完整，作品的曲谱和音响不完整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能否将一个真实、完整的人民音乐家形象呈现给后人，使后人能客观、完整地了解冼星海。

[1]周广平（1957—），男，山西山阴人，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进而，真正掌握冼星海作品的内涵与冼星海音乐思想的真谛。笔者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型冼星海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如：1995年在广州举行的星海音乐周大型纪念活动；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活动；2005年纪念冼星海诞辰100周年暨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博物馆落成；等等。以上谈到的问题，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专家、学者反复提到，如：建议编订冼星海年谱，进一步整理、修订作品曲谱，出版音响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是什么原因使得冼星海的研究不能深入？给我们后人留下众多不解之谜。近年来，通过先后参加了萧友梅、吴伯超、贺绿汀、马思聪、陈洪等人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客观、完整地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家的积极举措，对丰富、完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挣脱禁锢、尊重史实的研究态势，难道不能给冼星海的研究带来一些助推作用吗？以下将就冼星海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个人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期望能对冼星海的研究有所裨益，诚盼尽早地将一个客观、完整的冼星海形象展示给世人。

二、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及思考

但凡要完整地研究一位有成就、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不外乎要从几个方面系统地展开研究工作，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创作历程及创作特点等。相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其他音乐家来说，对于冼星海的研究，无论是投入的人力、物力，还是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都是空前的。但就目前冼星海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影响完整、客观地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方面，有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中都有论及，尤其是明言博士在《“洗学”研究甲子录》^①中谈到的“几多几少”，更是将冼星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相当详尽，本文就不再赘述，仅从冼星海在海外的几段经历入手，谈些思考和建议。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番禺一共生活了40年，在这40年里有三段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1905年出生后至1918年在新加坡生活过；1929年至1935年在法国留学；1940年至1945年在苏联。前后加起来占了他生命的一半左右的时间，而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正是冼星海学习、成长、成熟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正是这非常重要的三个阶段，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极其有限，而且这有限的史料也模糊不清，缺乏可信度。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冼星海的研究，使冼星海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1. 幼年、少年时期在海外的生活经历

关于冼星海的出生地，究竟是澳门还是番禺？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本人曾在澳门见到一条以冼星海名字命名的大道，旁边还立了一座冼星海的雕像。澳门人民以养育了冼星海而骄傲。而冼星海自己在1939年5月《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中写道：“父亲名喜泰，是广东番禺县人，做过打鱼和航海的事情。35岁就死了！”“我是一个怀腹子！祖父养我长大，到7岁时祖父死了。我和母亲靠着双手去奋斗……我还有妗母，表弟妹。表弟名黄春，做印刷工作，表妹已嫁，妗母在家缝衣过活。我还有三个舅，死了两个，一个不知踪迹，听说他是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失踪的。”以上自传材料说明：一是冼星海的家庭背景并不像有些材料中说的那么简单，只有母亲和祖父；二是冼星海应该与他提到的妗母一家有联系，起码冼星海母亲与他们有联系，从而得知表弟、表妹及三个舅

父的情况；三是能在向组织汇报的文字材料中提到的亲属，一般都是来往密切、知道底细的才会写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幼年时期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也许可以通过这些亲属的线索，了解到冼星海幼年时期在海外（新加坡）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父亲的家庭情况。现有资料中，还有谈到冼星海从小受其外祖父影响，学习吹箫，聆听水乡渔歌。这也许算是冼星海受的启蒙音乐教育吧！但外祖父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是不是与他自传中说的祖父是同一个人？这些都缺乏史料佐证。

2. 在法国留学时期

在冼星海长大成人后的生活经历中，有十多年是孤身一人生活在海外。1929—1935年在法国留学；1940—1945年在苏联度过。生活处境都极其艰难，几近生死边缘，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语言的障碍，使得与人沟通的概率极低，目前现有的实证材料，也多为与他有过交往的为数不多的华人的回忆文章。更多的资讯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创作杂记》等几篇自传体的文章。而这其中出现的错漏也是不少。如戴鹏海先生在《〈冼星海全集〉编辑工作刍议》中已有叙述^②。即使这仅有的支离破碎的段落，也都十分模糊。如：马思聪回忆冼星海在巴黎的时间是“1928年或1929年初夏”^③，连马思聪自己也记不清楚。这应该是冼星海接触最多、给予他最大帮助、最容易沟通的一位同乡。再如：冼星海入巴黎音乐学院到底是1931年还是1934年，也说法不一。他在《致李鉴堃、李燮华的信》中提到“弟已在今夏（1931年）入选乐院”^④，但是哪一所没说，估计应为丹第创办的法国国民乐派音乐专科学校。他自己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几年生活，只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⑤这里指的巴黎音乐学院又是哪一所？还有那位帮助过他的“女青年作曲家，我有很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另外还有许多书及稿件也关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有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大概现在还在吧！”^⑥冼星海在《创作杂记》中提到的那位钢琴伴奏“梅耶女士”^⑦是否与这位“女青年作曲家”是同一个人？以及那位“每月助我一百法郎，供给我很多音乐需要的书籍和音乐会的入场券”的“美国老妇人”又是何许人也？^⑧这些宝贵的线索，都缺乏有力的实证。据冼星海在《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中写道“我连考入两个世界著名的音乐学校：法国国民乐派音乐专科学校，法国国立巴黎音乐学院”，如能找到他读书时的学籍表或成绩单之类的材料该多有说服力啊！恰恰在这五年里，是冼星海一生中最系统、师从名师最多、专业学习时间最长、学习音乐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为他日后形成自己创作风格打下基础最重要的时期。虽然冼星海没有拿到一张正式的学位文凭，但他所师从的老师都是巴黎当时最有名的音乐家，如奥别多菲尔、杜卡、丹第，甚至连从苏联赴巴黎的普罗柯菲耶夫都对他大加赞赏。也可以说，他后来能创作出《黄河大合唱》那样成功的作品，绝不是无本之缘。其中的重要因缘之一，就是他多年的积累，尤其是留学法国期间，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但偏偏这段最重要的时期，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太有限了。其实，我们掌握的线索不算少，除上面提到的这些外，冼星海在《创作杂记》中也很具体、详细地介绍了他在巴黎创作、演出的经历。^⑨更重要的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上都有他在巴黎不同时期的地址。这对我们沿着他的足迹，寻觅有说服力的佐证材料提供了重要线索。

3. 在苏联时期

在苏联的这五年，又是冼星海离开祖国、离开亲人，孤身一人漂泊在外、苦苦挣扎的一段时期。这五年里更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空白。他的日记也只找到1940年3月以前的。有几封信件和《创作杂记》中虽有谈及，但也寥寥无几。虽然，近年来驻外领事馆人员的参与，如：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领事馆文化官员对冼星海在该国那段经历的发掘，为冼星海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启示我们这项工作不仅是我们音乐界的事情，还应发动全社会来关注和参与。还有俄罗斯籍华裔音乐家左贞观先生对冼星海在苏联的研究、探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可信的史料。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进冼星海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冼星海在这一时期扑朔迷离的行踪初显端倪。但遗憾的是没能将这种研究继续深入、扩大，几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冼星海亲身经历了苏德战争的爆发，这对他创作以战争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影响很大。冼星海在1940年赴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和配乐的工作情况如何，也鲜为人知。另外，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两年多时间里，到底完成了多少作品？是否都找到了手稿？有无照片或节目单之类的史料？据有关资料介绍，冼星海在1944年离开阿拉木图赴库斯塔纳音乐馆工作，这段时间里他的音乐活动相当频繁，有什么史料可佐证？在苏联的这几年里，是冼星海器乐创作最丰产的时期。早在1929年，冼星海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就读时就立下志向，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竭尽全力去实现他的理想。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他将自己一生的文化积淀，化作音符，谱写出激情满怀的乐章。但遗憾的是，我们掌握的史料太少了！虽然在《创作杂记》中记录了一些在苏联、蒙古的情况，但正如《冼星海全集》编委会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的：“他的作品分散在国内外多处地方，这使我们在整理出版他的全集时更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有些作品，我们迄今还没有找到，这只好期待来日补遗了。”^⑩从1987年至今，这“补遗”的“来日”已过了二十多年，是否太长啦！

4. 其他

谈到冼星海在海外的生活，必然要涉及语言能力问题。有材料说他俄语说得不好，靠用英语与人交流，尤其是左贞观先生在《星海在苏联之新探》一文中写道，冼星海正是因为会说英语，才与被称为“英国女人”的莱娅结识。^⑪那么，他的英语又是在哪里学的呢？新加坡养正学校吗？应该是吧。要是他有他学习的成绩单就有说服力了，可惜目前还没有找到。从他中学时期翻译的那篇译文《皇帝死了，皇帝万岁》来看，想必其英语已有相当水平。

其实，不仅冼星海在海外的行踪不甚清楚，甚至连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的情况也极其简单。他在几篇自传中为什么都不提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那段经历？而只写道“在上海曾跟私人学习小提琴及音乐理论，因生活困乏，欠债累累，不得已仍在失学生活中过日”^⑫。冼星海研究的史料残缺不全，至今也拿不出一份翔实、完整的年谱，使得在冼星海的研究文献中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情况比比皆是，致使冼星海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生活经历给人以神秘莫测、不完整感。

此外，冼星海作为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底蕴的音乐家，我们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极其缺乏。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正是他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虽然于1990年出版了《冼星海全集》，但还没有收录他全部的作品；即使目前已找到了曲谱，

也没有演出的机会，连录音也没有。“我不知疲倦地创作，但是至今没有听到自己作品的音响，真是非常遗憾”^③，这是冼星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感叹。这种遗憾不知何时才能让黄泉下的冼星海得以安慰？

人力、物力分散，重复工作多，研究的深度不够。立项的不少，但经费有限。大家各自为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缺乏统一筹划、集中调配，没有将有限的经费集中起来，收效甚微。

三、对冼星海研究的几点建议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二是要用史实说话。

1. 尊重历史，首先就要端正研究观念

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曾几何时，由于将冼星海“神化”，出现了汪立三等人的历史悲剧。不能客观、真实地评价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我想连冼星海本人也不允许这样评价他。包括在他一生中帮助过他的几位女人，写了也怕影响他的形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能遇到真心相助、给予关爱与温暖的人，这是多么感人、也是多么自然的事情啊！只有将冼星海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看待，才能从他平凡的一生中体会到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不朽贡献。

2. 沿着冼星海生活的轨迹，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

这一想法受益于一位在哈尔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前两年他带了一支摄制队走遍了中国周边各国，拍摄了一部名为《睦邻》的电视纪录片。当他回国途经广州见到我时，兴奋地对我说：“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见到了冼星海房东的女儿（应该是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当时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带一支摄影队，沿着冼星海的生活足迹拍摄一部纪录片，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与江苏省有关部门联合拍摄的十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梅兰芳》那样。通过已掌握的线索，再到冼星海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在海外住过的地方，再现他生活的环境。结合采访当时与他接触过的人（趁目前还有许多人健在）的解说，给人更清晰、更真实的感受。尤其是对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支摄影队要像考古队那样，不放过任何线索，不辞辛劳。队伍中除了有研究冼星海的专家，最好也有考古学家，以便甄别材料的真伪。上述的文献纪录片《梅兰芳》，较好地反映了梅兰芳一生的艺术贡献。同样是中国近代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见证人也有许多还健在，我想，以冼星海为题拍摄一部这样的文献纪录片应该是可行的。尤其就目前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及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而言，通过外交途径及驻外领事馆的协助，完成这样一部纪录片是完全可能的。另外，作为冼星海故乡的广东，既是经济大省，又是文化大省，完全有能力、有责任承担起这项历史使命，像当年举办“1995星海音乐周”那样，为冼星海研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此外，在广东有一批研究冼星海的专家、学者，并形成了研究团队。在历次纪念冼星海的研讨会上都有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充分显示了广东学者在冼星海研究方面的实力。尤其是以冼星海名字命名的星海音乐学院，在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专门设立有重大科研课题“冼星海历史档案、音乐作品与创作研究”。但由于经费有限，使我们的研究难以展开。如能以这个基地为依托，汇集广东省内乃至国内的相关专家、学者，由政府给予扶持，用几年的时间，下大力气，将冼星海研究推向深入，定能使这项研究更趋完整。

3. 在拍摄完成专题纪录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

在拍摄完成专题纪录片的基础上，调集部分研究冼星海的专家、学者，像当年出版《冼星海全集》那样，将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下大力气修订、完成冼星海年谱。虽然这些年有许多学者都在编写冼星海年谱，而且卓有成效，如齐毓怡等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使得年谱编写工作崎岖坎坷，甚至出现了1995年在广州举行的“1995年星海作品研讨会”上，戴鹏海先生批评某作家编写的《冼星海年谱简编》错漏百出。其实，打假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真实公之于世，让人们分辨真伪。目前，有一些冼星海的专题网站，其中有一个“世界冼氏联谊会”的网站中，除了有两届奥运会冠军冼东妹外，也开有冼星海的网页，通过这条线索也许会查找到冼星海父亲及其家族的一些线索。

4. 整理、出版冼星海的全部作品，包括曲谱和音响，让冼星海的理想变为现实

作为作曲家的冼星海，各类体裁的作品总计有二百多部。这对于一个只活了40岁的作曲家来说，算是一个丰产的作曲家了。尤其是与同时代的中国音乐家相比，所涉猎的音乐领域、作品的数量都算是一个佼佼者。应组织专家、学者对冼星海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而展现他作品的真正价值。

四、结 语

我们希望，将一个客观、完整的冼星海形象呈现给世人，让人们了解有血有肉的人民音乐家。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的轨迹，使冼星海的形象更加鲜活、感人。冼星海应是一位当之无愧、作品丰厚的音乐家，而不是因为某一部作品迎合了某种政治潮流或什么主义而成名的音乐家。正如朱践耳先生在“1995年星海作品研讨会”上的论文集《论星海》题词中写道：“以赤诚的心灵，深切的感悟，独特的个性，凝练出才华横溢的作品，星海为我楷模。”我非常赞成朱先生对冼星海的评价。同时，我也期待着这种研究方法推而广之，也能对其他中国近代史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进行系列性的研究。少一些争论，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实际、有效的工作。让每一位在中国音乐事业发展史上做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并展现他们作品中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① 明言，“冼学”研究甲子录[J]，音乐探索，2007，（1）：56-62；（2）20-25.

② 戴鹏海，《冼星海全集》编辑工作刍议[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2）：39-45；（3）：54-59.